

文史資料選輯

第 九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苏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選輯

第 九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苏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工作的开展。

二、本选辑所选资料，包括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前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事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四、本选辑对来稿可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积有相当数量即行出版，并不定期。

目 录

苏纶纱厂的回顾·····	浦亮元、徐鹤亭 (1)
创办“国货公司”记·····	张寿鹏 (19)
吴县县商会侧记·····	黄柱天 (34)
辛亥革命前后的苏州商务总会和纱缎业的挣扎图存 ·····	陶景瑗 (56)
苏州药材业的回顾 ·····	陈宝昌、陈焕章、陈汝霖、陆批、周维新 (62)
苏州典当业的盛衰·····	姬允奎 (80)
记美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冉冉 (101)
戎法琴先生纪事·····	希庄、定祺 (105)
苏州伪国大与立法委员竞选内幕·····	黄擎一 (113)
苏州“旅馆大王”始末记·····	朱宏涌 (117)
吴苑深处话当年·····	蔡云章 (133)
孙春阳与生春阳·····	朱宏涌 (137)
回忆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姚志曾 (144)
张一麟先生小传·····	甘兰经 (149)
记金松岑先生·····	吴雨苍 (155)
记王佩铮先生·····	甘兰经 (165)
姑苏书肆忆旧·····	夏淡人 (173)
编后说明·····	(196)

苏纶纱厂的回顾

浦亮元 徐鹤亭

前言

苏纶纱厂创设于一八九五年，是现代中国棉纺企业中历史较为悠久的一家。

十九世纪末，正是清朝洋务运动高涨的时期。一批洋务官僚，当时以“自强”、“求富”为名，纷纷创办新式工业，以便于其实行经济垄断。苏纶纱厂也就是当时洋务运动的产物。

一九〇〇年以前，国内创设的新式纱厂犹若晨星，因而能得到官方的照顾，处境比较优越。苏纶纱厂在此有利的条件下，开始发展较为正常。但由于在经营上全采用了一套官场中腐朽不堪的管理制度，所用之人多为官场引荐，官气十足，愚昧无能，醉心于巴结上司，争权夺利，致使苏纶纱厂人浮于事，用度浩繁，终于走上了失败的道路。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英、美、法、德等国商人亦援例纷纷来华开设棉纺织厂，优胜劣败，苏纶纱厂自然不能幸免。这也是苏纶纱厂连年亏耗，几度停办的重要原因。后来，苏纶只得招商租办，但由于国际国内局势时弛时张，战祸时无时有，纱厂的命运亦随之时好时坏。

一九二七年，上海民族工商业家严裕棠招标购得苏纶纱厂。他深谋远虑，审时乘势，集机械、纺织、地产于一体，互相支

持，相得益彰，而在工厂的经营管理上也有所建树，因此较之官僚办厂高出一筹，但由于世事变迁，亦屡有兴衰。所以，苏纶纱厂在严氏长期经营时和其他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既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发生过矛盾和斗争，同时又和它们有过利益上的结合。直至解放后的一九五四年，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苏纶纱厂才走上了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苏纶纱厂自创办至公私合营，历时六十年，我们在它的几起几落中，可以窥见当时中国政局的动荡对工商业的影响，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所处的地位，民族工商业对国家的贡献。

现在，我们将苏纶纱厂的历史加以回忆、整理，草成此篇。由于我们水平低，编写工作比较粗糙，其实际效果和主观愿望尚有一定的距离，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加批评和指教。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苏纶纱厂党委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表示深切感谢，同时得到了退休职工沈长增同志的通力合作和刘文渊、苏髯孙、李鸿业、徐子修诸同志的有益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第一部分 创办时期（1895——1925）

一八九五年，满清王朝洋务官僚张之洞奏准在苏州筹建苏纶纱厂和苏经丝厂（苏经丝厂建成后不久即停办）。当时由官方出面，向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五地典当主商借资金五十四万七千六百两银子（年利七厘），这些典当主既是债权人又是股东。然后在盘门青旸地附近租用土地一块建厂，每年付给租银七百两。建厂期间，又觉经费不足，另在地方积谷、水利备荒项下借支纹银二十三万五千两，约定逐年还本付息。

历时两年，苏纶纱厂于一八九七年建成，机器为英国制品——“道勃生”，计有纱锭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八枚，招募工人两千左右，由于当时国内缺乏技术人员，便聘用了几名英国人为总办和机匠，负责机器安装等技术工作。在建厂大体就绪时，公推清代末科状元陆润庠为经理，受苏州商务局管辖督办。

陆润庠在一八九八年去京，官方便续派纸商祝承桂（捐户部郎中銜）接办。在其经营的五年内，中国纺织业深受帝国主义纺织厂商的排挤。如棉纺工业比较集中的上海，当时就有四家外商纱厂（英商怡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共有纱锭十六万枚，占全市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三，而且外商纱厂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所具有的优越条件，实非华商所能比拟，所以华商纱厂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经营十分困难，苏纶纱厂也不例外。再加上祝承桂官僚习气严重，不仅嗜吸鸦片，进出厂须乘坐六人大轿，更可笑的是每当新春开工之时，必须摆起香案，由其率领全厂人员，朝蒸汽引擎顶礼膜拜，祈求保佑。在企业的经营上，也采用了官场的腐败管理制度，结果走上了亏耗和失败的道路，五年之内不仅无法清偿典当主的本利，还向德商瑞记洋行借债度日。此时，德商便想乘人之危，鲸吞苏纶，而祝承桂利令智昏，竟然表示愿意应诺，幸而多数股东的坚决反对，此议才作罢论。

当时苏纶面临重重困难，官方已无力维持，只得一面处分祝承桂，一面另行招商承租，最后由商人费承荫缔约租办，租期定为五年（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八年），每年租银为五万两，这样才能交付股东的股息，但利息由原定七厘改为三厘。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日本正处自顾不暇之时，减少了输出，因而洋纱进口骤减，国纱销路得以剧增，而且费氏的经营管理比官

僚略为高明，所以获利颇多，苏纶扭转了历年亏本的局面，每年除支付租银五万两外尚有较多余款。费氏在厚利的刺激下，于一九〇五年增添资金五万七千两，添购机器设备，扩大再生产。苏纶日夜开工，营业大振，引起不少人的觊觎，官方老股东更是垂涎三尺，欲悔约自办，但引发了一场官司后仍归失败。至一九〇八年，租期已满，老股东即收回苏纶，备款五万五千两收购费氏所添的机器设备，偿还祝氏时所欠德商的借款，聘请张履谦、吴本华为正副经理，规划经营。

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而告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在中国市场大批倾销洋纱洋布，我国棉纺织业又遭到无情的摧残。苏纶在收回时因偿付了两笔资金，已感周转不灵，欲再招募新股五十万九千两，奈何市场萧条，招得新股寥寥无几，只获十四万两。资金不足，花贵纱贱，致使亏蚀累累，不到三年，苏纶已难于维持，只得停工一年另七个月。此时，老股东再次同意招商租办苏纶，结果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由源记公司许松春租办。

许松春接办初期，苏纶曾经有过一点起色，但不久由于军阀混战，外国资本和商品的源源流入，加剧了我国封建经济的解体，农民破产，原棉奇缺，市销日绌，使苏纶周转困难，障碍重重。被迫停车半年。

延至一九一七年，苏纶再由宝通公司刘佰森以每年六万两的租金继续租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以后，欧洲各资本主义大国的许多纺织工厂改营军火生产，棉制品大量减产，对我国的出口也逐步减少。于是造成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机会，在五年中，刘佰森获利颇丰。租约到期后，其雄心勃勃，离苏至沪开办宝成纱厂。从一九二三年起，苏纶纱厂不得不停业待租。

一九二五年，上海民族资本家严裕棠租办了苏纶纱厂。其先与人合租，继而独租，再而买进，便使苏纶纱厂摆脱了自创建以后的三十年内由于时局不稳，屡换租户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进入由严氏父子经营达三十年之久的比较平稳的阶段。

第二部分 严氏租办与买进时期

(1925——1937)

严裕棠号光藻，原籍安徽，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出生于上海静安寺路后严家宅。

其父严介廷是英商自来水公司的小买办，叔父严介坪为英商老公茂洋行买办。严裕棠幼时学过英语，青年时代经叔父介绍到老公茂洋行从业，后又经父亲介绍去公益铁厂当跑街，由于其聪明干练，深得业主的欢心。

一九〇二年，严裕棠与铁匠出身的褚小毛合办了一家弄堂小作坊，雇用了十来个工人，专门为纺织厂、轧花厂做修配生活，取名为大隆铁工厂。当时华商厂家对机械设备的保全工作并不考究，机器的损坏较多，而专行修理的工厂尚少，同时，严氏还有一套灵活的生意经络，所以营业蒸蒸日上。为了便于发挥经营管理之长，所以改组，由其一入独资经营。后来，大隆以制造柴油机和修配制造纺织机件为主，营业十分发达，屡次扩大生产规模，逐步成为当时华商经营的最大铁工厂。

严裕棠除办厂外，还经营房地产的买卖交易。在十里洋场逐步形成我国的繁华都市的过程中，地产价格扶摇直上，严氏在房地产买卖中积聚了大量财富，又开始向棉纺织业发展，最后得以经营国内数一数二的棉铁联营企业，在上海商界具有一定的声望。

一九二五年，严裕棠同上海商人吴昆生、吴士槐合租苏纶纱厂，改名为苏纶洽记纱厂，互推吴昆生为厂长，吴士槐任工务总管。一年后，由于意见不合，废除了合租契约，由严裕棠独自租办，由其长子严庆祥任经理。

严氏租办苏纶纱厂时正逢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缓和时期，加之国内抵制洋货运动如火如荼，这对中国民族资本尤其对于民族棉纺织工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因此苏纶在这一时期获利甚巨。在高利润的刺激下，严裕棠便意图买进苏纶。当时，他以厂房危险为借口，继以停工停付租金的行动，逼老股东就范。老股东聘请律师控告严氏违约，严裕棠也聘请律师答辩，于是，一场诉讼便爆发了。

严氏在诉讼期间先声夺人，一面利用工人名义借厂房年久失修，危及工人生命为理由，发表联名呼吁，进行公开申诉；一面又疏通了报业人士制造舆论；另一面依靠国民党市党部及苏州士绅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由于严氏神通广大，打通了各处关节，所以尽管诉讼几经周折，最后苏纶老股东还是无可奈何，只得将苏纶纱厂招标出售，而严氏在招标时又施展了一番手法，终于以最低价格三十万零五百两银子买进苏纶纱厂。

自一九二七年秋天以后，苏纶纱厂就成为严裕棠的个人私产。于是他着手成立光裕公司（取其名字光藻、裕棠之首字），邀约李仲斌（南翔人，严庆祥之岳父）为股东，利用李当时在银钱业的信誉，沟通信贷渠道。这样，苏纶纱厂以九比一的股份比例（严氏为九，李氏为一）成为严李两家的合股企业。

买进苏纶以后，严氏确实化费了不少心思。曾屡次翻修厂房，扩大规模，提高设备能力和技术水平，使之逐步发展成当

时较为先进的纺织厂。

一九二八年苏纶纱厂整修投产时，仅有纱锭二万二千五百余枚，全厂以六百匹蒸气引擎作传动，并兼带照明。次年，严氏又在原轧花厂旧址扩建了第二工场，增添纱锭二万枚，同时又建立织布车间，安装布机三百二十台。两年之后，又添布机七百二十台，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织布工场，从此由单纯纺纱扩展为纺织全能。由于蒸气引擎陈旧落后，各种机器的传动危及安全，特别是动力已感不足，影响生产水平的提高，严氏便向国外订购二千五百 KVA 透平一台，并自建发电厂，代替了蒸气引擎，从而使生产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至三十年代初，经过修建，扩充的苏纶纱厂已拥有职工三千余人，年产棉纱三万余件，棉布十一万匹，沟通市场，平衡供需，严氏每年可获利达四十万两银子之多。

随着企业的扩大，严氏为了笼络人心，曾对职工的生活福利作了某些改善。首先在厂的南面买了一块土地，建造十三幢职工宿舍（共一百一十间），再将盘门城墙处苏纶原有的二十余间双层老工房加以整修，更名光裕里，仍旧租给工人，留存数间，开办学校一所，名为光裕小学三校（原在上海已设一校和二校），免费招收工人子弟入学。除此以外，厂内还设立简陋医疗室，特约盘门开业中医任援道为厂医，为全厂职工的伤病作简单治疗。

严氏在地方上也曾举办过一些公益事业，如盘门外公路上原有一座甘棠桥，年久失修，有倾塌的危险，严氏为此出资修建，致使行人称便。为纪念此项善举，甘棠桥修复后改称裕棠桥，并勒石永志。

严裕棠长期居住在上海，光裕公司办事处也设在上海，但

其自从买进苏纶以后，非常重视工厂内部的经营管理。他很懂得治厂之道，在于有足以信赖的人才，所以全厂各部门的主要人选不是严氏亲戚，便是他的亲信，其中不少是他的棉铁联营企业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贫寒人家的子弟，自小受严氏“恩泽”，又有比较优惠的待遇，因而对严氏一片忠心，不敢稍有所怠。另外，严裕棠还分别委派其子严庆祥、严庆祺等总理其事，这就保证了他对苏纶的大权独揽。

一九二八年，严氏为了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在整修厂房之时，建造了一座办公大楼，在办公厅的上方高悬着“和为贵”的匾额，两侧挂有“创业同创军，一心一德，日新月盛致霞蔚；治厂如治家，以勤以俭，朝乾夕阳见精神”的对联，要求全体职工“一心一德”，“以勤以俭”，精诚团结，爱厂如家，不遗余力地为严氏创造财富。可是，严裕棠的儿子们却经常为了权利而发生矛盾。原先，严裕棠任长子严庆祥为苏纶纱厂经理，并为其配备了厂长徐佐舜、厂务沈灏等一班人马。但严庆祥在其他方面投机失败，亏蚀累累，陷于困境，几乎轻生。从此严庆祥失信于其父，不得不把原由他总理的各厂交给诸弟分别掌管。当严庆祥的四弟严庆祺接管苏纶时，就撤换了原有的主要人马，任用徐润章、浦亮元、朱禄嘉、刘文渊、姚械芬、骆兆型、池养龙等人分任苏纶的各部负责人，襄理厂务。但尽管随着主要人物的进退，苏纶的管理人员常有替换，但是严氏对工人的剥削，却从未有过松懈。

当时，苏纶纱厂的工人以女工为多，分日夜两班，工作时间每班是十二小时，接班时间为早晚六时。工人的工资除少数按日计算以外，大部分是按件计算，细纱论“木棍”，摇纱论车数，织布论长度，但工资很低，六进六出仅能挣得伪法币五角至

七角，组长等人亦不过八、九角。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在当时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一旦失业就完全失去了生活保障。苏纶纱厂与其他同类工厂一样，也使用了不少童工，他们的工资则更是少得可怜，养成工时期劳动十二小时仅能得到法币二角。

苏纶和其他纱厂一样，实行抄身制度，防止出厂工人夹带东西。另外，厂里警卫组还设有“更表箱”，如果值班人员不值勤，不巡视，不启箱，“更表”就不转动，这就是所谓考勤。

与此同时，职员的待遇则迥然不同了。一般职员月俸可得一、二百元；中级职员的月薪为二、三百元之间，高级职员则在五百元左右，其中还不包括各种各样额外酬劳。

第三部分 敌伪时期（1937——1945）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奋起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大片祖国河山沦于日寇之手。

在日军进逼苏州时，苏纶纱厂只得停产遣散，严庆祺与一部分职员撤离苏城，经汉口，向内地迁移，一部分职工则分散避至乡间，仅由厂务主任浦亮元带少数员工护厂。在苏州沦陷前夕，鉴于日益险恶的形势，浦亮元才与护厂员工一起撤出苏城。兵荒马乱，交通阻塞，浦等从太湖迂回，行至常州，已难于后撤，便滞留常州乡间。半月之后，浦亮元绕道至苏，探听苏纶消息，在光福刘正康家中见到了严庆祥，他是从上海来苏，为苏纶而周旋。浦将其离开苏纶的最后情况面告了严庆祥，

严庆祥当即决定今后苏纶事务可由他自己处理，浦便离开苏纶。

自一九三四年以来，苏纶已由严庆祺执管，由于苏州沦陷，严庆祺撤移内地，蛰居上海租界的严庆祥则认为此时正是自己名正言顺地东山再起的好机会，因而在日军占领苏州以后，便马上赶到光福，企图与日方联系、意将苏纶变作中日合办企业，借此保护严氏产业，从而夺取经营苏纶的权利，但是，一开始便受到日方的拒绝。

三八年初，苏纶遭到日寇的大肆破坏，厂房变成军营，车间变成养马场，机器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几个月后，日军将苏纶交给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经营，改名为：内外棉纱厂苏纶工场。日方派出六十多名管理人员，用刺刀逼迫工人上班，苏纶才勉强开工。

在日寇经营苏纶期间，工人经常遭到打骂，生命没有保障，因而时时出现自发的斗争。一九四〇年元旦，苏纶第一工场遭到大火焚烧，全部厂房和二万余锭子及全套设备付之一炬。事后，日寇大肆搜捕嫌疑人员，厂内许多工人被抓，被打，并有多人失踪。

从苏纶被日军控制后，严庆祥为将苏纶收回自办，曾积极开展了各方面的活动。他的大儿子严达，是日本留学生，熟谙日语，在日本尚有同学私谊，所以他们就同当时日伪当局频经过从。

一九四一年，日本太平洋战事日趋不利，日本军阀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对其的愤慨、仇恨情绪，为了日商的长期利益，决定有条件地发还日军管理的部分工厂。其条件为：将原属中国资本的企业改组为“中日合办”，或由中国资本家拿出一笔巨

资，赎回本来属于中国资本家自己的企业。当时严氏接受了赎回产业的办法，由严庆祥出面，允以上海大隆机器厂让给日本，并划出苏纶纱厂的二十台布机专织日军军用布料，以十九万军用币为赎价，才得以赎回苏纶。

苏纶收回之日，严庆祥曾假大丸洋行（今人民商场）二楼宴请苏州的敌伪首脑与“社会名流”，并赞颂“中日亲善”并于1942年捐献飞机一架，定名为“苏纶号”。

在再次经营苏纶之初，严庆祥一面招集旧员，以徐佐舜为厂务主任，张晋华（纺部主任）、沈云卿（织部主任）、毛羽满（私人秘书）等人主管各部门工作；一面广购地产，重操房地产投机买卖。

开始时日寇管制较宽，苏纶生产正常，棉纱销路畅通，确有较多利润可获。但在德、意大败，特别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失利后，原棉受到日寇的严格控制，日纱又倾销于日占区市场，苏纶既缺原料，又受排挤，时有停厂危险。严庆祥看到工厂受到种种限制，很难维持，因而想方设法抽出企业资金化整为零。在厂内，他相继解雇外乡的工人，仅留本地工人来维持残局。在日军投降前夕，他又以每人一石米的代价遣散了全部工人，于是苏纶遂告停厂，派沈灏为留守厂长，直至日寇投降为止。

当时的局势，严庆祥大有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之感，因而先购进韩家巷鹤园，并大肆兴修，将它作为苏纶纱厂办事处，以此为据点，加紧拉拢日伪势力以作后盾。继而在观前街购进地皮，建四层楼房，开设裕苏实业银行，银行资金部分由其岳父李仲斌所筹，实力充沛，资金雄厚，在当时苏州的银行业中卓有声誉。接着购进昆山砖瓦厂、苏州老万盛酱园，并将少

数高级职员拉入股本，使他们永为严氏的忠实助手。

从一九四五年初起，苏纶已告停厂，但是资金的分散，并非良图，因为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严氏在经济上已大不如昔了，不过还总算维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

第四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派出大批接收大员分赴各地夺取胜利果实。苏纶纱厂例属汉奸产业（严庆祥因汉奸罪被控），由国民党经济部派吴闻天接管。

当年，严庆祺以“抗战人员”的身份四出求援，通过当时的政法系统的头面人物，得以恢复严庆祥的自由，苏纶纱厂才获得发还，仍为严氏产业。交由严庆祺掌管，从此苏纶厂又回到严氏手中。

接办伊始，困难重重，由于前几年生产极不正常，加上严庆祥早已将苏纶流动资金化整为零，或移作他用，或由其私人保藏，所以当时苏纶既无原料，又无资金，仅有库存四十二支棉线一百二十件可供周转，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严庆祺面对此情，便从二方面着手恢复：一面招集旧员，各司其职。应严庆祺所邀，参加复厂工作的有笔者和朱禄嘉、刘文渊等人。另一方面广开财源，与棉商商妥，以纱换花，获取原棉，并利用商业信誉抛售棉纱栈单，收取货款，充作周转资金。这样做以后，苏纶总算先开出四千纱锭，其后逐步恢复。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棉的大量倾销，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阶段的纱贵花贱的局面，每件棉纱可换棉花十至十二担，而纺纱一件净耗原棉四担，加上工资等其他间接成本也只六担而已，所以纺纱一件净利几达一倍。行情有利，管理得当，苏纶

经过一年惨淡经营，终于趋向稳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四七年至四八年，苏纶改投资为法币一百五十万元（合棉纱四千三百四十五件），陆续购置机器设备，扩大再生产。除恢复被焚的第一工场外，还建造厂房，增加纱锭，同时添置印染设备，聘请技师，准备开办印染工序，使苏纶成为纺、织、染全能企业。当时苏纶有纱锭三万七千枚，布机一千台，职工三千一百余人，原料三分之一是美棉，生产成品多数以纱易棉，获取厚利。

在恢复、整盛经营管理和机器设备的同时，严庆祺正视当时政治环境，如要发展自己企业，不结交国民党官僚，当地士绅就不能巩固苏纶的地位和发展，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伪装民主的幌子下召开国民大会，严庆祺为了企业，他只能挟资竞选立法委员，在政治上争一席之地以资保护，他不惜巨资，疏通报刊作舆论工具，出动张挂其照片的汽车招摇过市，以黄金、美钞打通地方官府关节，兴办一些公益事业扩大影响，如出资翻建阊、胥、盘环城公路，修建苹花桥，创办苏州公医院（现在一〇〇医院）等。最后，终以绝对优势压倒了竞选对手宋铭勋而如愿以偿。

严庆祺对外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对内则普施小惠、笼络等手段，严格管理职工。苏纶除具有其他同类工厂的苛刻厂规外，还注重潜移默化的管教。苏纶职工大都幼年进厂，以练习生等名义接受长期的训练和培养，不准阅读进步报刊和接受进步思想，逐渐养成唯命是听的驯服性格。在这方面，苏纶确有独到之处，因而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力量就难以进入苏纶，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亦难以进行，即使偶尔出现工人的自发斗争，其中的首要人物也不是被处分，就是被开除。到四七年